

# 公平正义与社会秩序的重构\*

——重新解读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等小说

林丰民

**内容提要** 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世界唯一的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作家，其作品受到极大的关注。但对其后期的代表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解读，由于读者和评论家不同的出发点，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偏向于宗教倾向的学者认为该作品亵渎了伊斯兰教，而世俗主义倾向的读者和评论家则认为该作品反映了马哈福兹对未来社会中科学将代替宗教的思考。但在2011年发生了所谓的“革命”之后，我们重新审视马哈福兹的作品，可以发现作家想表达的可能是公平与正义对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性，一旦社会失去了公平与正义，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甚至激烈的革命都是难以避免的。

**关键词** 马哈福兹 埃及小说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公平 正义

在当前阿拉伯社会动荡的局势下，重新审视马哈福兹（1911 - 2006）的作品给予了我们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视角，让我们重新认识到马哈福兹作品的价值。以往对马哈福兹作品的认识局限于他对埃及社会的批判，有的甚至误读马哈福兹的作品，认为他亵渎了伊斯兰教，还有人在马哈福兹年近耄耋之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我们从当下阿拉伯的局势尤其是埃及“阿拉伯之春”革命出发，重新审视马哈福那部颇富争议的作品《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发现作家早就在这部作品中对埃及发生剧烈变革做出了隐形的预言。他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和其它同类的作品中向我们喻示了一个社会演变的规律：公平与正义才是维

护社会稳定的不二法门，一旦社会失去公平与正义，则剧烈的变革乃至血腥革命的发生将成为必然。

## 一、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不同解读

阿拉伯评论界对于马哈福兹作品的解读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的，也大体上符合社会的语境。对人们公认的马哈福兹代表作“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都认为马哈福兹对埃及社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真实发展过程的描述颇有代表性。当时的埃及大文豪塔哈·侯赛因认为马哈福兹描绘了艾哈迈德及其家族“所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变迁》（项目编号：12JJD750009）的阶段性成果。

处的混乱的环境，描绘了悲伤有之、欢乐有之的大小各种不同的事件”。<sup>①</sup>如果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审察，可以发现这部作品表现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人民反帝爱国的民族斗争，也体现了新一代人在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向保守势力和封建传统发起冲击的过程。新与旧斗争的结果，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逐渐削弱，传统礼教与陈旧的价值观念逐渐为新思想、新意识和新观念所代替。

但是对马哈福兹后期的代表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解读过程中却出现了偏激的观点。可以说，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解读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解读这部作品的学者从其思想根源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秉承世俗主义思想的普通知识分子和读者，一种是接受了伊斯兰原教主义思想的宗教学者。

无论是世俗主义评论家的解读，还是伊斯兰原教主义倾向的学者的解析，都不否认马哈福兹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至于所象征的内容是什么，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结果。世俗主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用象征主义手法，以一个街区的创建者及其五代子孙的故事寓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人类在追求幸福和理想的过程中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斗争，说明知识与愚昧的斗争必然导致宗教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过渡，因为“科学是现时代的宗教”。<sup>②</sup>我们看到世俗主义学者强调的是马哈福兹对于科学作用的思考。尤其是作品中的第五代子孙的代表人物阿拉法特被认为是科学的象征。阿拉法特为拯救人民而潜心研究“魔法”，<sup>③</sup>为消除长久以来积存在人们心中的迷惑、揭开老祖宗之谜，他潜入大房子，失手掐死了仆人，吓死了老祖宗。但是阿拉法特后来却得到大家的认同，人们认为他的魔法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在他死后纪念他，甚至把他的名字排在其它几代子孙的代表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

姆之前，把他当作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

但马哈福兹后来说明自己是同时重视宗教和科学的，认为科学和宗教应该成为伊斯兰社会两个不可或缺的支柱。在这部小说中，他试图借助宗教的途径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以便在建立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将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支柱替换成另一支柱”，走向通往文明世界的道路。埃及评论家加利·舒克里指出，“纳吉布·马哈福兹试图用以替代旧支柱的新支柱便是科学。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于1959年9月21日至12月25日每天在《金字塔》报上连载时，引起埃及反动派的极大恐慌。”<sup>④</sup>

加利·舒克里在这里所说的埃及反动派便是指那些思想比较极端的具有伊斯兰原教主义倾向的学者和保守势力。正是他们把马哈福兹推上了亵渎宗教的审判台。他们认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的各代人分别象征人类始祖阿丹，<sup>⑤</sup>宗教时代的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现时代的科学与知识，认为该小说是“对大闪族的各种宗教进行编造”。<sup>⑥</sup>保守势力据此而将渎神的罪名加诸马哈福兹身上。

伊斯兰原教主义倾向的评论家详细地分析了小说的各种细节，从中找出马哈福兹渎神的证据。为了证明马哈福兹对伊斯兰教和诸位先知的亵渎，他们首先从小说的情节入手，将小说中的情节与宗教人物的事迹建立关联。他们认为老祖宗杰巴拉维在沙漠中创建了街区，是隐喻安拉（上帝）<sup>⑦</sup>创造了世界；第一代子孙伊德里斯（Idris）是（魔鬼）易卜利斯<sup>⑧</sup>（Iblis）的谐音，而其兄弟艾德海姆（Adham）则是阿丹（Adam）的代名词。小说开头部分写到老祖宗杰巴拉维选择艾德海姆代替伊德里斯，被认为说的是真主（上帝）选择阿丹取代魔鬼一事，因为在《古兰经》中提到“我必须在地球上设置一个代理人”；<sup>⑨</sup>而伊德里斯的抗辩之词“我和我的兄弟是良家妇女所生，而这个人只不过是黑女仆的儿子”，则被拿来

比附《古兰经》中魔鬼所说的话“我比他高贵，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sup>⑩</sup>小说中，杰巴拉维说艾德海姆了解佃户的情况，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名字，还能写会算，这一情节则被拿来比附《古兰经》中所说的“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神”；<sup>⑪</sup>艾德海姆的妻子乌梅妹（Umamah）这一名字也被拿来分析，认为它是阿拉伯语里母亲（Umm）一词的指小名词，暗指乌梅妹为人类的第一位母亲哈娃；<sup>⑫</sup>艾德海姆后来在妻子乌梅妹的怂恿下去偷看遗嘱而被双双逐出大房子，暗喻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被赶出伊甸园。

第二代人杰巴勒则被看成是摩西（穆萨）的化身。他们首先从字义上分析“杰巴勒”一词：它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山”，而摩西便是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真主）的启示的，说明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有关杰巴勒的描写在这些读者和评论家看来也与摩西的故事有不少吻合之处。如杰巴勒住在耍蛇人巴尔基忒家里，帮助耍蛇人的两个女儿沙菲卡与赛伊达汲水，并且与沙菲卡结婚成家，这颇似摩西与牧羊父女的故事；杰巴勒带着妻子悄悄回到街区后对大家讲述自己在黑暗的沙漠中听到老祖宗杰巴拉维的声音，则被认为可对应摩西接受上帝启示一事；杰巴勒施展从岳父那里学到的魔法，消除了恶头人放进哈姆丹家族各居所的毒蛇，则有着摩西用手杖与法老斗法的影子；哈姆丹家族在杰巴勒的带领下挖掘深坑，然后引诱恶头人及其手下人马落进陷阱，然后水淹土埋，予以歼灭，这情节颇似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法老追兵被淹而以色列人奇迹般地安全渡海的神迹。

第三代人里法阿在这些学者看来是耶稣的象征。在里法阿的身上不少有耶稣的影子。他们指出小说中描述里法阿虽是木匠沙菲仪和妻子阿卜黛的儿子，却长得与传说中的老祖宗的相貌最为相似，由此联想到基督教徒相信耶稣

乃上帝之子；里法阿主张非暴力，向说书人的妻子学魔法为穷苦人治病，驱除他们身上的邪魔秽气，由此认为马哈福兹是在暗示耶稣治愈麻风病、失明、瘫痪等治病和驱魔的神迹；里法阿不受妓女雅斯敏的诱惑，但为了解救她，却舍却与头人的女儿定亲的机会而与雅斯敏结婚，由此联想到耶稣与妓女的故事；里法阿还收留了四个改邪归正的人跟随他走四方，治病救人，由此情节联想到耶稣与十二门徒的故事；最后雅斯敏背叛他，向恶头人告发里法阿及其追随者的出逃计划，导致里法阿被抓并被处死，由此联想到犹太人的背叛致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等等。在这样的分析中，他们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宗教人物划了等号。

很显然，《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具有象征意象与象征意义，这是由作品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马哈福兹本人也承认小说人物的象征性，他说“我首先要承认，我为小说中人物取的名字，是与先知的名字平行的，我想把社会作为宇宙世界的反映，以宇宙世界的故事作为本地的外衣。”<sup>⑬</sup>但究竟象征什么意义，读者的理解却出现了巨大的分野。对于世俗主义者来说，正像接受美学理论的建立者姚斯所说的那样“美学作品不以为人知的审美形式打破读者的期待，同时向读者提出宗教或国家认可的道路所无法问答的问题……它能冲破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的禁区，为人们生活实践中出现的道德疑难提出新的解决方案。”<sup>⑭</sup>对马哈福兹小说的阅读和接受赋予这些世俗主义读者对世界的一种全新感觉，从宗教和社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既能顺着马哈福兹的视角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看到谋求社会公正的艰难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又使他们看到实现的可能性，为他们开辟新的愿望、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为他们打开对未来经验之途——科学的道路。

另一读者群的期待视野则恰恰相反。那些宗教思想浓厚的学者和读者所需要的正是要把

正在走向世俗化的社会拉回到固有宗教的轨道上去。因此，他们看到的便是作家亵渎神灵、反宗教的一面。马哈福兹“这种象征语言的缩微导致了对他的指控：轻视和嘲讽众先知及其使命……暗讽所有的宗教使命在实现人类公正与幸福方面的失败”。<sup>⑤</sup>他们把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宗教人物对应起来之后，便把小说的各种情节全都看成是宗教人物的言行。如他们把里法阿、高西姆看成是耶稣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象征，那么在读到里法阿与妓女雅斯敏结婚后不能生育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耶稣性无能的嘲讽；而在读到高西姆在新婚之夜喝酒、吸食大麻的情节时，他们认为这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亵渎。更要命的是，在他们认定了小说中的老祖宗象征着创造世界的真主之后，却在结尾读到了老祖宗的死亡，犹如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而这样的思想和说法，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因为安拉（上帝）是不生不死的。

这样的解读方法和解读结果必然把作者推进到读神的群落中去。问题在于，这一读者群并非完全以艺术审美的正常方式来阅读这部小说的。按照审美的规律，主体的能动性、个体性、体验性中存在着一种内在制约性，集中表现在审美客体中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形式结构对主体的定向导引上，它使得接受主体（审美欣赏者）的再创造不至于出现随意性、非理性以及伪审美性。但这一读者群浓厚的宗教意识恰恰使他们的阅读、接受过程呈现出极大的非理性和随意性，因为他们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当成宗教史而非文学作品来读。

马哈福兹本人曾对此提出抗议：“《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问题是：我从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小说’来写，而人们却把它当成‘著作’来读。小说是既有事实又有象征、既有现实又有想象的一种文学构成……不能把‘小说’判别为作家所相信的历史事实，因为作家选择这种文学形式，无须保持历史的原

貌，他只是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意见。”<sup>⑥</sup>马哈福兹的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位评论家的支持：“如果纳吉布·马哈福兹写宗教史，那么像他那样对宗教了解得细致、深刻而又全面的作家，难道会忽视古代法老的宗教，或忽视在中国、印度、东南亚有着亿万追随者的佛陀和孔子吗？……纳吉布·马哈福兹对生活其中的时代和对时代发生巨大影响的力量有着强烈的意识。如果他要写宗教，决不会忽视佛教与儒教。”<sup>⑦</sup>尽管马哈福兹进行了辩解，一些世俗主义的学者也对马哈福兹的说法给予了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消除那些思想极端的人对马哈福兹所持的偏见。以至于马哈福兹在他84岁高龄的时候都没能逃过极端分子的刺杀，差点就因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这部作品而魂归真主。<sup>⑧</sup>然而，正是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马哈福兹的远见卓识，看到了他对公正理念和公平社会的追求。

## 二、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马哈福兹的公平理念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小说中的表现，被“阿拉伯之春”印证了他超前的思想意识。2011年2月25日埃及爆发了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从而掀起了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尽管后来持续动荡的埃及局势和整个阿拉伯局势的变化让人们思考这是否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有的人反而将其解读为“阿拉伯之冬”，也有人称之为“阿拉伯之秋”，但无论如何为这一场民众运动命名，这一动荡的局势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稳定，从而也在文学评论界引起对一些作家喻示和预示革命的作品关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埃及前作协主席萨尔瓦特·阿巴扎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的小说。

在普通读者看来，《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从世俗主义的角度考察，该小说仅仅是描

写了几代人为实现理想而斗争的故事: 老祖宗杰巴拉维在沙漠边开垦了一片地, 建立了街区,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老祖宗退隐起来, 在大房子里深居简出, 隔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成为后代子孙们心中永恒的谜。第一代子孙为获得老祖宗的代理权而斗得不亦乐乎, 结果一正一邪的两个儿子都被逐出家门, 流落到沙漠中, 过着艰苦的生活。老祖宗在退隐之后, 对街区实行了代理管理的制度, 管理街区的头人被赋予了维护街区秩序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街区头人慢慢地腐化、腐败了, 用暴力对付老百姓, 使街区失去了公平与正义。第二代子孙杰巴勒看到广大民众在恶棍头人的强征暴敛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忍无可忍之下率领众人与恶头人抗争, 用武力夺回了被剥夺的继承权, 恢复了街区和平公正的秩序。第三代的代表人物里法阿对幸福的观念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心平气和地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视财产、力量与威望如粪土, 却乐于为平民百姓治疗疾病, 以为人们驱邪逐魔为乐, 过着一种去贪欲、消仇恨的充满友爱精神的生活。第四代的代表人物高西姆, 在老祖宗的启示下率领受压迫的人民上山习武, 与残暴的头人做坚决的斗争, 终于夺回控制权, 恢复了街区的太平景象, 使杰巴拉维的子孙重又获得平等的权利。马哈福兹似乎在暗示我们: 只要社会失去了公平和正义, 尤其是统治者不能维持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秩序的时候, 那么发生革命、重新建构社会秩序的历史趋势便难以阻挡。

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马哈福兹自己承认是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对正义的思考促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基本宗旨, 是描写对正义的伟大梦想及永久探求。小说想对一个核心问题做出答复: 实现正义的武器, 到底是暴力? 还是爱? 或者是科学? 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 是革命胜利后, 具体而言是 1958 年前后传出的各种消息, 这

些消息表明: 革命后出现了有着很大权势的新的阶级, 以至于封建王朝时期的社会现象又再现了。这让我非常失望, 有关正义的思想在我头脑中不断出现, 这便是产生这部小说的首要原因。”<sup>①</sup>既然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 那么由谁来维护和实现呢? 是由领袖、英雄人物来实施? 还是由平民百姓去贯彻?

马哈福兹在作品中给予我们的答案是两者都是重要的。一位西方的评论家在分析马哈福兹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平民史诗》时说道: “马哈福兹在《平民史诗》中关注领导者的本性, 英雄任务的塑造……同时也暗示普通人对英雄人物的创造与毁灭有着比自己想象中更多的责任。”<sup>②</sup>

在《平民史诗》中, 马哈福兹通过阿舒尔家族一代代人的故事彰显了正义的原则, 表现了一种和平、有序的社会运行模式, 尤其是第一代的老阿舒尔作为平民的代表即便在取得权力以后也遵守个人行为的正义, 不做伤害别人利益的事情, 限制自己的权力和财富, 不侵犯他人, 以一种合理的尺度对待所有人, 尤其是善待穷人和平民, 而对代表富人的绅士阶层给予限制, 从而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他的行侠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基础之上。他重操旧业, 住在地下室里, 手下的人都靠做工获得糊口之资。这样, 无赖被消灭。只对头面人物和有能力的人征收税金, 同时周济穷人和残废者。阿舒尔战胜了邻近各条大街的头领, 我们这条街的声威空前盛大, 势力扩大到其他地区, 街内实现了公正、仁爱和平安。<sup>③</sup>

如果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和《平民史诗》更多关注的是社会重大的变动甚至发生革命的问题, 那么, 《千夜之夜》<sup>④</sup>则聚焦公平正义的缺失与局部重构社会秩序的关系。埃及作家苏莱曼·法雅德(Sulaiman Fayad) 认

为，马哈福兹“最重要的关注点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国家政权、官僚体系、街区的权力斗争以及族长的控制”。<sup>23</sup>在《千夜之夜》中，发生了那么多的凶杀案，大多是因为地区执政官的贪婪、腐败、滥杀无辜而激起了民愤，最终导致有人挺身而出，杀死失去了公平与正义的地区执政官。而国王山鲁亚尔走入民间的体验，感受到的也是一个失去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状况。“山鲁亚尔站起身来，胸中心潮澎湃。在花园的长廊走着，天上繁星密布，地上黑暗重叠，他显得那么渺小。往事的种种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有胜利的欢呼、忿怒的咆哮、少女的哭泣、臣民的祈祷、伪君子的赞歌，还有讲台上的颂扬。这一切，淹没了花园里的所有声响。他看清了这虚假的荣耀，撕下破纸糊成的面具，露出来的尽是残暴、凶狠、杀人、抢劫的毒蛇。他诅咒自己的父母；诅咒杀人的打鬥；诅咒诗和诗人；诅咒虚伪的骑士、国库的盗贼、居家的暗娼。他诅咒那些抢来的金银珠宝；诅咒自己把钱挥霍在那些道貌岸然、寻花问柳、醉生梦死的人身上。”<sup>24</sup>《千夜之夜》中的国王山鲁亚尔比起《一千零一夜》里的国王山鲁亚尔更多地意识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性。这恰好说明了马哈福兹借助《一千零一夜》来进行故事的全新演绎，正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公平正义之理念。

公平与正义的思想不仅体现在马哈福兹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平民史诗》、《千夜之夜》、《法图麦游记》、《卡斯泰米尔咖啡馆》等小说中，更是在他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得到详细的解释。他曾在埃及最大的报刊《金字塔报》上撰文表达对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带来社会公正的赞赏，他认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七月革命给埃及人民带来的最好礼物便是社会的公正，具体体现在革命之后建立的许多国有机机构、公民享有的免费教育和其它的社会保障。<sup>25</sup>在埃及革命领袖纳赛尔去世（1970年）的第四天，金字塔报上

刊登了马哈福兹的悼念文章，题为《天上的话语》。他在这篇悼念文章中所赞赏的纳赛尔的主要成就也在于纳赛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埃及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 全球都在为你送行，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 我的欣慰，在于阿拉伯祖国的独立，和她牺牲的土地得到公正的解决。
- 我最喜欢的道路，将是前往祭奠你的清真寺的道路。
- 我的道路是正义，是通往科学和社会主义之路。<sup>26</sup>

我们从马哈福兹悼念纳赛尔的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马哈福兹对纳赛尔这位领袖人物的盖棺论定主要就在于纳赛尔带领埃及人民实现了“公正的解决”，率领埃及人民走上正义的道路。当然，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带领人民走向公平与正义道路的领导力，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也同样需要承担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责任。

### 三、革命的预言

马哈福兹对于公平正义主题的长久而深入的思考，使他强烈地意识到公平与正义对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革命与重构社会秩序的必然性，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对革命的预言。从这一意义上看，我们不妨也将马哈福兹看成是一位“革命的先知”。

在《平民史诗》中，残暴的头领使街区的秩序完全失去了公平和正义，失去了幸福和快乐的生活，广大平民终于忍受不了头领的残暴与不义，终于在小阿舒尔的带领下奋起抗争：

从参加的人数看，这是本街上空前未有的一场大规模斗争，其中平民百姓占了绝大多数。这大多数人突然结合起来，拿起棍

棒,冲出房舍、店铺,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声,撕破了罗网,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头领宝座又回到了纳基家族手里,阿舒尔当了头领,由他组织的民团,第一次囊括了本街平民的大多数人,从此以后,没有发生过暴乱,平民紧密地团结在头领阿舒尔的周围,阿舒尔像一座雄伟的建筑物耸立在平民之间,人们用建设的眼光望着它,全然没有毁坏的想法。<sup>②</sup>

马哈福兹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已经表达了公正与正义的主题,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创作一部主题相似的《平民史诗》呢?这恐怕跟当时萨达特总统上台以后埃及的社会状况不无关系。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尤其是各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促使他再次思考公平、暴力与革命的关系。1977年1月,由于食品价格暴涨而在埃及引发了一场城市边缘人口卷入自发性暴力事件,“这是1952年7月以来人民群众首次暴力反抗政府”。<sup>③</sup>自此以后,埃及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1952年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革命在纳赛尔的领导取得胜利以后,埃及建立了和平、和谐的社会秩序,社会的运行进入了一种稳定的状态,马哈福兹感受到了新政府领导下的埃及人民幸福的生活,因此,他觉得既然社会问题都解决了,他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没有必要再应用自己手中的笔去反映社会的问题,此后他基本处于封笔的一种状态。没想到这种公正、和平的社会秩序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埃及社会就又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于是,新的社会状况再次引起他的忧思,促使他再次拿起手中的笔,为社会的公正而继续奋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就是他封笔六年之后的新作。然而《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在1959年在《金字塔报》上连载之后便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小说遭到查禁,不允许出单行本,一直到十年之后才在黎巴嫩出版了单行本。但黎巴嫩公开出版的单行本依然

被埃及禁止。<sup>④</sup>因此,埃及普通的读者很难读到这本小说,自然也很难了解马哈福兹的公平正义思想。或许这是后来促使他创作《平民史诗》和其它同类主题的小说作品的重要动因之一。

如果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侧重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那么,《平民史诗》则更像是他对1977年以后一系列暴力事件的预言。如前所述,埃及1952年革命以后第一次爆发暴力事件是在1977年,而《平民史诗》出版的时间就是1977年,那么马哈福兹创作这部小说的时间必然是在1977年之前,而他构思这部作品的时间则应更早。

阿拉伯的评论家也指出了马哈福兹的作品对于革命的预言。萨尔比尼·吴克苏里(Ash-sharbini Al-'uqsuri)说道“我很急切地想谈谈文学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疗养期的梦》(Ahlam Fatrah An-naqahah),它像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其他作品一样超越了时代,这些作品呼吁革命,作为人民的一种要求,去实现自由、公正和平等。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预言、警示了革命——‘平民’的革命。”<sup>⑤</sup>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结尾实际上也是革命的一种预示“老百姓的一举一动或一句笑话,都可能招致毒打。街区被恐怖所笼罩。面对强暴,大家挺直腰杆,满怀希望,保持沉默。他们遭受迫害时,总是自我勉励说:暴政一定会结束,黑夜过去是光明。让我们亲手埋葬暴君,迎接光明的未来,迎接奇迹的诞生!”<sup>⑥</sup>

有学者认为,马哈福兹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探讨了革命的问题,探讨革命发生的各种原因,有的作品是对革命原因的直接揭示,有的则是间接的反映和思考。“马哈福兹在不止一部作品中涉及到这些因素,从《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开始,不是直接的揭示,而在后来的作品里则进行了直接的探讨。”<sup>⑦</sup>当然,更直接的表达也在于他的许多文章中有所论述。他

专门写过一篇《社会公正》的文章，认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创造社会的公正：“第一，民主，保障法律、政治、个人权利；第二，国家保护无产者免受有产者的剥削，保证必要的服务，为之创造、提供条件；第三，工作与生产的规划，以实现丰收。平等是富裕的平等，而不是匮乏的平等。”<sup>⑩</sup>马哈福兹对于公正的理念明显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他对公平正义的大量思考是使他获得预感的重要来源。

在马哈福兹看来，革命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会不断发生的。只要社会偏离了公平与正义的轨道，革命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就是难以避免的。在中篇小说《卡斯泰米尔咖啡馆》中，他说道“革命的列车从一个站台驶向另一个站台，取得无数的胜利，克服各种的障碍，战胜各种挑战。”<sup>⑪</sup>在马哈福兹看来，革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革命就会重复发生。而要避免革命的发生和巨大的社会动荡，就要维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 结 语

诚然，马哈福兹的小说创作是埃及社会的一面镜子，无论是《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还是《平民史诗》，抑或《千夜之夜》等，都是对阿拉伯社会向何处去，阿拉伯社会如何发展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尽管这几部作品并不像他的其它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那样直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批判埃及社会的黑暗现实，但它们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更为深入地思考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变革甚至发生革命运动的深刻命题。我们只有揭开其作品的层层帷幕，才能看到马哈福兹真实的思考：公平与正义才是社会平稳向前的根本之道，一旦社会失去了公平与正义，发生革命则必将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

## 注释：

- ① 塔哈·侯赛因《两宫街》，原载《我们的当代文学》，开罗1959年版，转引自加利·舒克里编《纳吉布·马哈福兹：半个世纪的创作》，舒鲁格出版社1989年版，59页。
- ② 乔治·托拉比虚《纳吉布·马哈福兹象征主义之旅中的真主》，转引自穆罕默德·叶海亚、穆阿太兹·舒克里《穿过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街区通往1988年度诺贝尔奖的道路》，开罗，乌玛出版社1989年版，1页。
- ③ 这里的魔法实际上象征着科学。
- ④ 加利·舒克里《归属：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研究》，今日消息报社1988年版（1964年第1版），239页。
- ⑤ 即圣经中的亚当。伊斯兰教承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旧约》和《新约》，但国内的伊斯兰学者将圣经人物的译名进行了另外的处理。
- ⑥ Pirre Cachia, *An Overview of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9.
- ⑦ 在阿拉伯语中，安拉与上帝用的是同一个词，即Allah，真主是国内穆斯林为区别于其他的宗教而采用的译名。
- ⑧ 又译易卜劣斯。
- ⑨⑩⑪ 《古兰经》2: 30, 38: 36, 2: 31, 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 ⑫ 即《圣经》中的夏娃。
- ⑬ 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150页。
- ⑭ 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转引自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343页。
- ⑮ 穆罕默德·叶海亚、穆阿太兹·舒克里《穿过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街区通往1988年度诺贝尔奖的道路》，开罗，乌玛出版社1989年版，121页。
- ⑯ 艾哈迈德·凯马勒·艾布·麦吉德《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作证》，载《金字塔》报1994年12月29日。
- ⑰ 拉贾乌·纳卡什《论纳吉布·马哈福兹之爱》，开罗，舒鲁格出版社，1995年第1版，171页。
- ⑱ 马哈福兹于1994年遭遇极端分子的刺杀。杀人凶手受到某些清真寺里的长老的宣传蛊惑，说马哈福兹的小说亵渎先知，亵渎伊斯兰教，应该杀掉他。在宗教界地位较高的长老的确曾经表示马哈福兹该杀的想法。爱资哈尔的长老欧麦尔·阿卜杜·拉赫曼就曾经说“要是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发表的时候，我们就杀掉纳吉布·马哈福兹，就不会有后来的萨尔曼·拉什迪了。”参



- 见 Raja' An-niqash, *Najib Mahafuz: Safhat min Mudhakaratihi wa Adwa' Jadidah ala Adabihi wa Hayatihi* (Markaz al-Ahram li-Tarjamah wa an-Nashr, 1998), 144 页。
- ①⑨ Raja' An-niqash, *Fi Hubb Naguib Mahfuz* (Dar Ash-shuruq, 1995)。该段内容参考薛庆国译文,个别地方有改动,见《自传的回声》,150-151 页。
- ②⑩ Catherine Cobham, *Enchanted to a Stone: Heroes and Leaders in The Harafish by Najib Mahafuz*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7), p. 2.
- ⑪⑫⑬ 纳吉布·马哈福兹《平民史诗》,李唯中、关偶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3,614页。
- ⑭ 中文版更名为《续天方夜谭》。
- ⑮ “Revealing conflicts”, Interviews by Youssef Rakha, *Al-Ahram Weekly Online* (《金字塔周刊》), 13-19 December 2001, Issue No. 564.
- ⑯⑰ 纳吉布·马哈福兹《续天方夜谭》,谢秩荣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206页。
- ⑱ 参见纳吉布·马哈福兹《月亮的另外一张脸庞》,《金字塔报》1982年12月30日。
- ⑲⑳ 纳吉布·马哈福兹《天上的话语》,《金字塔报》1978年10月1日。转引自《自传的回声》,155页。
- ㉑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224页。
- ㉒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一直到2006年才在埃及有条件出版。其条件是由一位爱资哈尔的权威长老为之作序,为读者进行评判性的引导。
- ㉓ Ash-sharbi al-Uqsuri, “Kawabis al-Waqi' fi Ahlam Fatrah an-Naqahah 'inda Najib Mahafuz”, Website Al-aqbat Mutahidun, <http://www.copts-united.com/Article.php?I=1944&A=44211>, posted at 10th, Jan. 2012, visited at 9th, Jun. 2014.
- ㉔ 纳吉布·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李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434页。
- ㉕ Shaoqi Abd al-Hamid Yehye, *Youniyou 67 wa Atharihi fi ar-Riwayeh al-Misriyyeh* (Al-Hai'ah al-Misriyyeh al-'Amah lil-Kitab, 2000), p. 30.
- ㉖ 纳吉布·马哈福兹《社会公正》,《金字塔报》1982年12月2日。
- ㉗ Najib Mahafuz, *Qashtamir* (Dar sh-Shuruq, 1988), pp. 104-105.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责任编辑: 魏丽明

###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g House in Yeats's Poetry**

**YANG Shenghua**

The Big House , as a special cultural symbol ,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Yeats's poetry and in Irish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Yeats probes into the identity of the Anglo-Irish Ascendancy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glo-Irish alienated culture , the Anglo-Irish masculinity in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g House , in which the social ,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Ireland is unveiled.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g House widens the meaning of the dividing line , reflects the declining aristocratic pride , proves to be the symbol of Irish order and tradition , and has become the connecting point to bridge British dominant conventions and Irish creativity.

### **Justice and Revolution: Rereading *Children of the Alley* and Other Novels by Najib Mahafuz**

**LIN Fengmin**

Naguib Mahafuz is the only writer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Arab world and whose works are read and criticized by many. Readers understand his novel *The Children of Gebelawi* ( 1959 , also known as *Children of the Alley*) differently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views. Some regard it as a kind of desecration of Allah ( God) , and some regard it as his thinking of a future that would change from a religious society to a scientific one. When we reread this novel after the Arab Spring , we find that what he would like to express is the importanc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a society. Once we lose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society ,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a great social change or a fierce revolution.